康德时间图型[[1]](#footnote-1)困境与卡西尔“功能性”解决

摘 要

作为联结被康德割裂的感性与知性的中介，“时间图型”在康德认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存在于康德文本中的对此概念的两种不同理解以及运用的张力揭示了“时间图型”无法弥合感性与知性的困境，同时提供给哲学家消解这一困境的两种日益分离的路径。面对着这种对立局面，卡西尔对该问题提出一种以“功能性”指向为特点的解决方案。依次考察存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对康德“时间图型”的解读，二者各有缺失，尝试通过考察卡西尔以“功能性”指向重新赋予时间以图型地位进而弥合“精神”与“生活”的对立，首先要考察卡西尔本人对于康德文中冲突处的理解，并在功能性、认识的关系结构等概念的基础上，廓清时间“功能性”作用的内在机制，展现卡西尔通过此方式弥合康德体系中这一裂隙的可行性与局限。

关键词：时间图型；综合；功能性；关系结构

**Abstract**

As the structure mediating the separation of Understanding and Sensibility, Kant’s time scheme possesses an essential position in Kantian *analytic*. Yet two separate understandings and manipulations of this concept articulated in Kant’s text reveal the dilemma of time scheme as well as two increasingly separated paths for philosophers to solve it. Faced with this antagonistic situation, Cassirer proposed a solution featuring “functionality” orientation to the problem. We embark on the solution of existentialism and logicism championed by Heidegger and Carnap, each of which has its own deficiency. From this, this article transfers to Cassirer’s work that re-empowers Time with the mediating status, precisely to replace the dualistic opposition between “sprit” and “life” with a “functionally” oriented developmental process. From Cassir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itial cracks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ions like “functionality” and “structure of mathematical relations”, it explain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ime functionality, showing Cassirer’s feasibility and limitation of bridging this crack in Kant’s system via the way above.

**Keywords**：time scheme；synthesis；functionality；structure of relation

目 录

[一、哥白尼革命中的重要一环 2](#_Toc5868861)

[（一）时间图型的重要地位 3](#_Toc5868862)

[（二）时间图型的经验运用 4](#_Toc5868863)

[1.时间图型与先验想象力 4](#_Toc5868864)

[2.时间图型在因果性问题上的运用 5](#_Toc5868865)

[（三）、时间图型的困境 7](#_Toc5868866)

[二、卡西尔之于康德时间图型的“破”与“立” 9](#_Toc5868867)

[（一）时间、有限性与普遍 9](#_Toc5868868)

[（二）时间、分析与综合 11](#_Toc5868869)

[（三）直面康德的时间困境 12](#_Toc5868870)

[三、重获“图型”地位的时间：主观到客观的保证 14](#_Toc5868871)

[（一）时间与认识的关系结构 15](#_Toc5868872)

[（二）时间与整体 16](#_Toc5868873)

[（三）卡西尔的难题 18](#_Toc5868874)

[参考文献 19](#_Toc5868875)

导 言

处于启蒙运动高峰时代的康德哲学体系，对于几乎全部人类思想都进行了出色的综合。通过对于感性、知性、理性这三种能力的描绘，康德哲学建构出一个一切人类所共有的规范性的普遍结构，从而宣言在人的各个生活领域中客观实在性和主体间有效性 [[2]](#footnote-2)普遍存在。其中，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即时间与空间）作为介于判断的纯形式与感官所提供的感性杂多之间的先天结构使得认识对象成为可能。借助于知性的先验图型，即将与感性直观相关联的某种确定的时空内容赋予思想的纯形式，我们才能够使范畴具有客观性与必然性，进而进一步借助自我意识的先验统觉，通过综合形成完整且有意义的经验世界。

然而，知性的先验图型是否能够承担起连接感性与知性的桥梁作用本身却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纯粹理性批判》的文本本身即暗含了对于时间性质的两种不同理解[[3]](#footnote-3)，而基于对于时间的两种断裂的理解之上的时间图型的运用显示出知性的先验图型所隐含的困境，这使已经分离的感性和知性的联系变得困难。而现代数理逻辑和数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数学的纯分析性，从而颠覆数学“借助于纯粹直观而对数学概念进行先天‘构造’”的观念。时间形式被排斥出数学领域（而数学正是自然科学理论中感性与知性共同产生知识的重要例证），这使得时间图型的这一困境更加突显。[[4]](#footnote-4)

为解决康德体系中的这个裂隙，新康德主义者大都明确拒绝康德关于感性能力与知性能力的核心区分。[[5]](#footnote-5)由于知性的先验图型在康德体系中的特殊位置，这种拒绝使得科学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似乎变得无可避免，因为纯粹形式的逻辑不再被视为人类思想无可争议的普遍形式，因而也不再可能被视为思想文化生活的哲学框架。这样一来，摆在人们面前的似乎只有日益分离的两条路：如以卡尔纳普为代表坚持把形式逻辑当作普遍有效性理想， 并将我们框定在数理精确科学的哲学中，抑或如海德格尔一样从生存论的角度将我们同逻辑形式分开，最终放弃真正普遍有效性的理想？我们不禁要问，在承认知性的先验图型的困境下，是否存在一种对于时间与空间的理解，使得感性与知性可以重新结合并且避免上述对立呢？与二人同时代的卡西尔回答了这一问题，他对这两种观点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并继而寻求一种康德式的综合的方案。一方面，作为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主将之一，他提出在先验感性论中描绘出来的心灵的两种能力的截然分离与先验图型可能存在矛盾的原因，并且与后康德主义者一样，拒斥康德的感性与理性二分理论。另一方面，当他结束了对于出现于康德体系并导致分野的系统裂隙的探讨之后，他并没有转向逻辑主义或存在论现象学，而是对二者持有批判态度并继而寻求一种调和的方案。他尝试通过考察人的认识的发展，强调时间的功能性并进而使时间重新作为连接直观世界和理论世界的中介，以“功能”指向的发展过程代替愈演愈烈的“精神”与“生活”的对立[[6]](#footnote-6)。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问题逐步分析康德的知性“先验图型”产生的困境以及卡西尔对其的批判以及通过语言的功能性重新确立时间与空间中介作用的努力。第一，卡西尔如何看待康德以先验图型连接感性与知性产生的问题？第二，逻辑主义与现象学对此困境的解决方案在哪些方面出现了问题？第三，卡西尔以功能性阐释时间如何能够弥合感性与知性的对立？他建立主体间有效性的努力是否成功，又存在哪些局限？

# 一、哥白尼革命中的重要一环

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论使知识的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有效性成为了很大的问题。[[7]](#footnote-7)因此，如何能够从原则上证明思维和对象、知性和感性之间的一致关系就成为了康德亟需解决的问题。通过从认识的主体能动性出发，将思维解释为先验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活动，而把认识的对象解释为被这种综合统一所整理过的、具有感性经验内容的现象，康德可以说第一次为真正的科学知识确立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既突出了科学知识一定要有感性直观作为自己的对象，同时又强调这样的知识一定能具有普遍必然性或客观实在性（在康德的意义下）。而时间概念，则在这个康德明确区分了感性与知性的认识论体系中承担了重要的连接感性与知性的桥梁作用。时间意识是先验演绎中主、客观演绎的出发点 [[8]](#footnote-8)，先验的时间规定——图型 [[9]](#footnote-9)，则是弥合先验与经验、范畴与直观杂多的中介性环节。[[10]](#footnote-10)

## （一）时间图型的重要地位

与以往的哲学家一样，在面对知识的客观实在性与普遍有效性困境时，康德明确承认感性与知性作为人的两种重要认识能力的分离。“我们的知识产生自两个基本的内心根源，其一是感受表象的能力，其二是凭这些表象认识一个对象的能力”。[[11]](#footnote-11)分别作为被动的直观接受能力与自发产生概念的能力，感性与知性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以及与对象的关系。然而，康德同时认为，直观和概念是“构成一切知识的要素”，因此，如何使感性直观置于概念之下变得可理解，如何使知性概念通过直观被提供出来，即如何联系感性与知性，就成为知识能否获得客观实在性与普遍有效性的关键。继“先验感性论”中阐明时空是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形而上学演绎”表明存在知性的诸范畴，“先验演绎”表明纯粹范畴对于经验必不可少后，我们来到了问题的关键，即诸范畴如何能够得到恰当的应用。康德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对已经被直观给予我们的对象进行规定，从而使对象建立起来。在对象与概念的对应中，“每当把一个对象归摄到一个概念之下时，对象的表象都必须和这概念是同质的，就是说，这概念必须包含有归摄于其下的那个对象所表象出来的东西。”[[12]](#footnote-12)然而，知性的纯粹概念（范畴）与可以直接在直观中接受的几何学不同，它们“并不通过直观和感性的谓词，而是通过先天的纯粹思维的谓词谈论其对象，它们是在没有任何感性的条件下与对象相关；因为它们并不基于经验，且不能在先天直观中展示任何客体”。只有逻辑内容的范畴，与后天的感性直观在起源上异质，由此与表象异质，我们不能直接将范畴应用于表象。

为了克服这种异质性，我们必须去寻找一个中介，按照上述归摄的要求，它应该既与范畴同质具有综合统一性，另一方面又需要与表象同质而能够包含于其中。康德认为，这个中介就是时间，而能够将概念应用到对象的条件则由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提供。如盖耶尔指出，依照康德，只有诸范畴的逻辑内容能与某些同样先天且普遍的性质相联系时，诸范畴的这种纯然逻辑上的内容才能应用于表象。而作为先验的时间规定的图型，则可以作为满足这一条件的中介。[[13]](#footnote-13)一方面，时间作为内感官的杂多的形式条件，是联系一切表象的形式条件，包含有纯粹直观中的某种先天杂多。而图型则“无非是按照规则的先天时间规定而已，这些规则是按照范畴的秩序而与一切可能对象上的时间序列、时间内容、时间次序及最后，时间总和发生关系的。”[[14]](#footnote-14)图型是不同的先验的时间规定，是时间关系和结构的特征，由此与诸范畴相联系。另一方面，先验的时间规定也与对象同质，因为时间被包含在每一经验表象之中。基于此，康德指出，“既然时间的先验规定由于是普遍的、且基于先天规则之上的，因而与构成其统一性的范畴是同质的，另一方面又由于时间包含于任何经验性的杂多表象之中，因而与显象也是同质的，所以范畴运用于现象之上只有借助于先验的时间规定才有可能，这种时间规定作为知性概念的图型，就是把现象包摄于范畴之下的媒介。”[[15]](#footnote-15)具有逻辑内容的范畴与具有经验内容的表象异质，图型作为一种中介，使范畴应用于对象得以可能。那么，先验图型在何种程度上消去表象与范畴的异质，以及它能够消去表象与范畴的异质性的这种能动性是何以可能的？对此，我们必须考察先验想象力的作用，进而通过考察时间图型在因果性范畴上的运用，使这一问题更加明晰。

## （二）时间图型的经验运用

## 1.时间图型与先验想象力

在成功论证了时间图型可以作为中介连接被明确区分了的感性与知性后，康德发现，要想通过时间图型的联系真正使感性与知性的认识达到一致性，那么时间图型本身必须具有统一性、综合性并发挥主动的作用，“图型作为范畴与感官对象之间的媒介，不是一个静止的环节，而是一个活动、能动的环节”。[[16]](#footnote-16)想象力的介入使时间图型的综合性得到了保证。康德认为，“图型既与范畴同种又与表象同质”，而“图型自身总是想象力的一种产物”[[17]](#footnote-17)。虽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两版中对想象力的地位作了不同的阐述，（第二版中，想象力在康德看来是“即使一个对象在直观中不在场时也适合表象一个对象的能力”[[18]](#footnote-18)，通过再生出外部感官的形式结构来类比于真实的直觉。而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作为不同于感性与统觉的心灵本源的能力，想象力本身就因一方面与直观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因具有自发的、进行规定的性质而被视为能动的、中介的能力。）但极其重视对康德两版“先验想象力”概念的分析的海德格尔也承认，它们都是“摆脱了经验的（erfahrungsfreie）、然而首先又使经验成为可能的纯粹的生产性的（produktive）想象力。”[[19]](#footnote-19)不论两版中先验想象力的地位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认为，康德始终坚持先验想象力是一种自发的和形式上的联结。想象力分为先验想象力与再生想象力，其中再生的想象力是使作为意象保持在自我意识中的直观再现出来，使得不需要外界的刺激就可以与自身的意象同在，而先验想象力既是内感官的统一性，又是使这种统一性得以建立起来的综合规定性，其体现就是时间的图型。也因此，先验想象力以自身的综合性、自发性保证了时间图型的综合和能动作用。康德总结道：“由此可见，知性的图型法通过想象力的先验综合，所导致的无非是一切直观杂多在内感官的统一，因而间接导致作为与内感官相应的机能的那种统觉的统一。所以，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就是给这些概念带来与客体的关系、因而带来意义的真实和唯一的条件。”[[20]](#footnote-20)

### 2.时间图型在因果性问题上的运用

通过肯定人的一切认识首先从感性经验出发，同时强调这种感性经验本身蕴含了先天的知性能力，康德将理性派内孕育着的主体能动性原则和体现在经验主义怀疑论中的主观性原则结合在一个体系中，从而将主体能动性首次引入认识领域，使感性与知性可以共同构成知识的要素并获得知识。而恢复被休谟摧毁的因果性，正是论证获得知识何以可能的重要环节。

先验想象力与时间图型作为同一种心理机能的自身及其具体表现，对于恢复因果性的普遍有效性具有非常核心的作用。一方面，康德以先验想象力为武器批驳传统的经验意识，而另一方面，因果性的重建所依赖的因果性范畴的图型正是时间的前后相继关系。

为恢复因果性的普遍有效性，康德首先对经验意识进行了批判。对于笛卡尔的唯心论，康德的批判以“想象力的功能发挥以外部感官为前提”这一思想作为前提。笛卡尔对外部世界实存的怀疑论论证最清楚体现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表述中，他认为，我们无法确认自己是否在做梦，因为清醒时的感觉可以在梦境中被精确表现出来。[[21]](#footnote-21)康德的反驳认为，虽然凭借想象虚构出来的梦可以和清醒时通过外感官刺激而形成的知觉具有同样的表现形式和性质，因而能将当时并不存在的事物视为表象而给予我们，但是，只有借助于外部感官形式，我们才能够将某物梦见在自身之外。因此，虽然笛卡尔的前提即想象虚构的梦具有与外部知觉同样的形式与感觉得到承认，但是其结论却被拒绝，因为没有外部感官被刺激形成知觉为前提，想象力本身无法构造出梦。对于洛克的“心灵白板说”，即不需要规定性活动对象即自然而然呈现在主体面前的理论，康德则认为，作为认识的主体无法获知也无法干预物自体如何连接诸表象。既然主体无法获知外在客体本身是否提供表象，那么这种综合的作用只能是主体自身的活动。只有经过想象力的先行规定，主体才能具有意识。

康德通过构造因果性范畴图型来重建被休谟摧毁的因果性关系，而想象力的先行规定，即时间的先验形式，正是因果性范畴图型得以产生的必要性条件。

在原因和结果这一对概念之中，难以证明的根本的问题在于因果性及其普遍必然性不能够由经验归纳得来，因为“这一概念总是要求，某物A具有这种性质，即有另一物B从它里面必然地并按照一条绝对地普遍的规则产生出来。现象完全可以提供一些场合，从中可以得出某物恒常第发生所依据的规则，但其后果永远也不是必然的：结果应该不只是附加在原因上的，而是通过原因建立起来、并从中产生出来的。” [[22]](#footnote-22)这种单纯的前后相继的表象杂多并不能提供因果性判断的保证。因为原因和结果并不能在经验中直接被给出，二者也不是非概念化的表象，因此必须依照因果性范畴的图型解释为“原因与一般而言的事物的图型，就是这种实在的东西，基于这种图型，任何时候原因被设定，某一不同的东西就接着发生。在这种相继服从一种规则的范围内，这种图型因此在于杂多的这种接续” [[23]](#footnote-23)，我们可知，时间的自发规定性，即前后的相继关系虽然无法直接得到因果性的证明，但是时间图型在知性的纯粹形式上，也就是时间顺序上的不可逆性，却是因因果关系而产生的经验知识的必要条件。“客观的相继就在于现象之杂多的秩序，按照这个秩序，对一个（发生的）某物的领会是根据一条规则而跟随在对另一个（先行的）某物的领会之后的。”[[24]](#footnote-24)因果性的必然性首先以时间的先验形式为前提，一个结果的产生必然以时间上在先的原因为前提。正是有了时间图型的前提，我们才可以认为，有了因果性规则之后，“如果先行状态确定，则这个确定的事件就免不了必然地会跟随而来”[[25]](#footnote-25)。时间图型的经验运用再一次被提了出来，“借助知性，现象的系列就把如此这般的次序和固定的关联在可能知觉的系列里产生出来，且使之成为必然的，恰如这种次序和关联在内直观形式中，即一切知觉都必定在里面有其位置的时间中先天地被发现的那样。”时间顺序上的不可逆性是因果性知识产生必不可少的前提。

无论是在消除纯粹概念与经验对象的异质方面，还是在解决范畴到经验的具体应用上，时间图型都被赋予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正因如此，康德后的解释者海德格尔与卡西尔都一致认为，图型论与先验想象力理论处于康德分析篇的中心。[[26]](#footnote-26)而康德本人对此也曾认为，通过图型法解决“将表象归属到纯粹知性概念或范畴之下”这一问题“如此自然而重要”。[[27]](#footnote-27)

## （三）、时间图型的困境

通过从感性直观中分析出普遍必然的先天形式，进而将更为根本的内感官形式——时间或时间的先验规定，作为先验想象力所产生的图型，康德为知识、为自然设立了一个将感性直观与普遍必然性紧密结合的全新标准，它既突出了科学知识一定要有感性直观作为自己的对象，同时又强调这样的知识一定具有普遍必然性或客观实在性（在康德的意义下）。康德的体系已然勾画出人类站在近代科学的高度为自然界确立普遍的、主体间有效的规则的图景。在他考察了时间的先验本性之后，他曾自信的认为，唯理论和经验论在时空问题上的困难都已解决。“在我们关于这两种本源的感性形式的真正性质的理论学说中，这两种困难就都消除了。”[[28]](#footnote-28)

然而，对于时间图型是否能够成功消除知性概念与感性直观之间的异质，早在康德生前就出现了质疑。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蒂夫特隆科在致康德的信中提到，“我注意到图型法理论的一个巨大难题，即知性的纯粹概念如何能运用到表象上。《纯粹理性批判》中说，要想使一个经验性概念归属到知性的概念上在逻辑上成为可能，必须有二者所同质的某种东西。然而，同样是《纯粹理性批判》告诉我们，知性纯粹概念与感性的表象的来源完全不同，前者是知性的成果，而后者是直观能力的产物。这种不同在来源上始终保持着，不能有任何同质的东西能够从中发生出来。”[[29]](#footnote-29)这直接揭示出康德时间图型理论中的困境：纯粹知性概念或范畴应用的客观实在性和有效性没能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弥合感性与知性的分离的时间概念在康德体系中本身便有两种对其性质的不同理解。对于时间的理解一方面呈现出空间化的时间观的特点，“因为时间的一切关系都能够在一个外部直观上面表达出来”，“所有一般现象、亦即一切感官对象都在时间中，并必然地处于时间的关系之中”[[30]](#footnote-30)，是先天的形式框架；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具有能动性，不受外部空间事物的影响而建立起主体内部的经验对象，时间本身“只能是内心通过自己的活动、即通过内心表象的这一置入、因而通过自身而被刺激起来的方式”[[31]](#footnote-31)即因感性与知性的分裂，时间性质本身也被分裂出两种理解，即既是纳牛顿时空观入认识主体的先天的形式框架，又是能够把客观性建立起来的主体能力。[[32]](#footnote-32)

康德认识论体系的建构目的即在于原则上证明思维与对象、知性和感性之间的一致关系，通过从认识主体能动性出发，通过时间图型的联系把认识的对象解释为被先验统觉的综合活动所整理过的、具有感性经验内容的现象，他认为困扰着经验论与唯理论哲学的难题已经得到解决。他深刻揭示出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之间的矛盾，但他将先验自我意识的自发性与感性直观的接受性分别归于两个来源并通过时间图型来连接的解决方法，“一方面钝化了矛盾，另方面却带来了认识主体和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之间的更大矛盾”[[33]](#footnote-33)，时间无法弥合感性与知性的这一困境，导致了后康德时期的巨大分野。康德体系中的这一“裂隙”对于后康德时代的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家不断挖掘康德所赋予时间的能动性，努力发掘想象力、“知性直观”和内在时间意识的创造性的能动作用，这一传统到20世纪初发展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时间概念的内涵已上升为本体论上的重要概念；而随着现代数学的发展、现代逻辑的发展，逻辑主义认为，已经可以证明出数学可以不借助时间这个先天概念而完全分析的得出。认识虽然表现为“不断趋近一个X型的关系结构”，但已没有了时间的直接参与。[[34]](#footnote-34)沿着康德时间图型中对时间这两种理解的“裂隙”的两边，认识论领域中对感性或知性的强调的分歧不断扩大，“要么我们跟随卡尔纳普，坚持认为形式逻辑是普遍有效性的理想，并相应的把我们自己限制在精确的数理科学的哲学中，要么跟从海德格尔，将我们与逻辑和‘精密思维’切断关系，结果是最终放弃真正普遍有效性本身这一理想”[[35]](#footnote-35)作为分析传统与欧陆传统对立不断加剧时期，和卡尔纳普与海德格尔同时期的哲学大家，卡西尔面对着这一鸿沟进行了“英雄之举”[[36]](#footnote-36)的康德式融合的努力：知性与感性领域是否还能找到一种统一性，是否还存在着一种对时间图型的理解，使数学与非数学的文化科学具有普遍的主体间有效性成为可能？

# 二、卡西尔之于康德时间图型的“破”与“立”

正如前述所见，处于二十世纪初的卡西尔，所面对的是基于出现在康德认识分析论中时间图型无法解决感性知性二分这一“系统裂隙”所发展出的逻辑实证主义与存在主义的日益对立局面。在这种对立的局面中，一方是卡尔纳普所代表的以精确科学为导向的哲学研究方法，另一方则是由海德格尔拥护的从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向来发展哲学的明确尝试。我们可以首先从卡西尔与上述二者在时间问题上的交锋来逐步探讨卡西尔是如何通过在这一“越来越宽的鸿沟上架设桥梁”，来克服“当代形而上学”中“精神”与“生活”的对立，重建康德感性与知性统一性的努力。

## （一）时间、有限性与普遍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时间图型的概念做过极为开创性的解释。康德后一百余年的海德格尔，深刻揭示和发展出康德关于时间本身是一种“力”，是运动的自发性和能动性的深层观点。[[37]](#footnote-37)海德格尔非常重视康德对于时间的这一层理解，在他看来，《纯粹理性批判》并没有提出一种知识论，一种关于数理自然科学的理论，它的真正意义在于阐明了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根据这种阐释，形而上学只能奠基于对有限的人类理性之本性的分析之上。由于有限，人的知性必然依赖于感性直观。海德格尔还进行了一些更为激进的阐释：康德引入的知性的先验图型能够将感性与知性融于“共根”，即先验想象力，而其最终的基础则是时间性。海德格尔通过在先验想象力、直观与前后相继的时间之流中建立起对应性，认为纯粹直观是一种构造性的直观，而时间作为直观形式同时就是对直观对象的构造或给予。“毋宁说，先验想象力让作为现在序列的时间呈现，因此，它作为让呈现者（entspringenlassende） 就是源初的时间”[[38]](#footnote-38)。纯粹直观、源初的时间和先验想象力成为了同一回事，而康德提出的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和依据的三重综合（直观中领会的综合；想象中再生的综合；概念中认定的综合）则表现为一种本质性的时间构造，想象、再生、认定。而最终，以概念为基石的真理属于“概念认定的综合”而这种综合本质上就是一种时间构造，于是，一切真理都被纳入时间之中，所有真理归根结底都是历史性的。“这暗示，西方形而上学所植根的罗各斯、理性或精神的传统最终被明确摧毁了。”[[39]](#footnote-39)真理或知识的普遍性，非时间性被彻底颠覆。

对于康德时间图型的这样一种反理性主义阐释，卡西尔持有旗帜鲜明的反对态度。在他与海德格尔进行的达沃斯论辩上，卡西尔表示，虽然赞同海德格尔对于先验想象力根本的重要性的观点，但是他强烈反对人类因此被限制在“无理性的”有限领域。康德本人即已表明，有限的人可以从这种有限中解脱出来，达到客观有效的、永恒必然的真理领域。只要认同自然科学中存在普遍规律，道德领域中存在普遍的道德律，这种客观性的存在便很难否认。面对海德格尔的怀疑主义，卡西尔采取了康德式的分析的方法：即从既定的科学事实出发（在卡西尔处它扩展到道德领域与文化领域），但不再停留在纯事实层次来探求这一事实成为可能的唯一条件。从已知的东西出发“追溯到人们不知道的源泉，而这个源泉的发现将不仅给我们解释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同时也将使我们看到从那里发源的许多知识。” [[40]](#footnote-40)他以数学为例，挑战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读：“现在（从海德格尔的解读中）推出，有限的存在者本身不可能拥有永恒真理。对人类来说永恒必然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对康德来说，这里的问题是：在无损于康德本人已指明了的那种有限性的情况下，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在内容上不仅有限而且普遍有效的判断。这就是康德以数学为例证的问题：有限的认识置身于与真理的关系之中，它不再发展出一种‘仅仅’”。[[41]](#footnote-41)

卡西尔显然拒绝只在有限性上考虑时间，因为基于此的“此在”与“自由”，都难以再与客观、普遍有效的意义产生关系。海德格尔质疑“普遍有效的”真理概念本身，而这正是卡西尔所反对的。在一方面，卡西尔拒绝这种反理性主义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康德对于时间作为一种“框架”的理论，例如在《人论》中卡西尔曾提出，“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42]](#footnote-42)，但同时，站在相对论等现代数理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他拒绝一种绝对时空观的观念（虽然康德也反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观点，但他的时空观仍被视为将牛顿的时空观纳入主体认识中，因为其时空观的主观性观点“逻辑地包含着时空观的绝对性观点”。[[43]](#footnote-43)“认为空间和时间的现象对于一切有机存在物都必然是同一无二的，这是十分天真而无根据的想法”。[[44]](#footnote-44)但在卡西尔的理论中，他仍将时间图型视为重要的过渡工具，在这一点上，他认为海德格尔“的确对时间性等概念在更加基本和原始的人的符号意识的层次（主要是直观表象）所扮演的角色作了非常富有启发的分析”[[45]](#footnote-45)。正是对于时间性的这种认识，卡西尔同样明确的表达了对纯逻辑分析的批判。

## （二）时间、分析与综合

海德格尔对康德问题的解决通过时间的解释明确将一切认识限定在有限性之中。然而他无法避免的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逻辑形式的概念不可能是经验的实际对象的一个本质的构成要素，而只能是一种人为的、派生出来的从真正具体的经验境况中的抽象。这样，思想的逻辑形式不可能具有任何哲学解释力。与这一种解释鲜明对立的，是卡尔纳普所拥护的逻辑分析的立场。和新康德主义（以及卡西尔）的立场一样，他也极力反对康德本人的二元论的心灵概念而希望发展出一种严密且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对于感性直观的时间在认识论中的剔除从而将认识论或哲学转变为逻辑——数学的一项构造任务。现代的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的发展已经表明，数学系统可以不借助时间空间概念构造出来。逻辑主义进而认为，数学可以通过纯粹的形式逻辑表示出来，因此是分析的而不是综合的，康德关于数学的综合特征的观念是不成立的。卡尔纳普改造了康德原本的客观性来源，根据康德对客观性的观念，为人的客观性知识与主体间交流奠定的建构性的先天综合的最终基础乃是在纯粹感性形式中被系统化了的纯粹形式逻辑。[[46]](#footnote-46)而去除掉纯粹感性，“意味着我们虽然保留了建构性观念，但却将它仅仅归入纯粹形式逻辑，先天分析的构造取代了先天综合的构造。”[[47]](#footnote-47)就这样，哲学的任务就在于用逻辑实际写下所要求的纯结构的限定摹状这一纯形式的任务。而在卡尔纳普看来，这种构造观念在传统认识论上是一致的（例如“实证主义”、“实在论”和“唯心论”所争论的不过是最终哪些被构造的结构是“实在的”）[[48]](#footnote-48)，因此，这种逻辑-分析的方法的建立消解了哲学传统的争论，数理逻辑的严肃性和清晰性使得哲学最终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构造》第一版的序言中笃定的认为：“这种新型哲学的产生同各专门科学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工作有密切的联系。于是，人们也力求把科学家的严格负责的态度作为哲学工作的基本态度……各个哲学家不再想一下子就建立起一幢完整的哲学大厦，而是每一个人都在同一个总的科学中在一定的职位上进行工作。”[[49]](#footnote-49)卡尔纳普摒弃时间性，拒斥先天综合的观念，以一种认识的分析“构造”理论（所有对象，无论是形式的还是经验的，都是在他所构造的以约定性为前提的特定关系结构中的类型等级内部在某些有限等级上定义或构造的）以克服康德“哥白尼革命”残余的二元论问题。不过，对于时间性及感性直观作用的这另一种极端的态度，也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困难。例如弗里德曼曾敏锐地指出，他最终没有办法基于约定性的设定来反驳先天综合。[[50]](#footnote-50)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卡西尔与卡尔纳普产生了明确的分歧，在卡西尔看来，虽然使得认识对象成为可能的先天的形式结构来自于知性的逻辑能力，但并不意味着先天分析可以取代综合，也不意味着时间失去了在数学中、在理性知识中的作用。事实上，卡西尔完全没有忽视时间在文化科学与数理科学之间的统一性的可能之间所起的作用。虽然卡西尔从没有拒斥现代数理逻辑纯数学的成就，但他否认它们能够代表数学在哲学意义上是纯分析的，因为认识论的任务乃是发展一种“经验知识的逻辑”：“只有当我们理解，逻辑和数学所基于的基本综合同样也支配着经验知识的科学构造，是它们可以使我们谈及现象间的一种固定的规律的秩序，从而谈及它们的客观意义——只有到那时，才能真正证明它们的正当性” [[51]](#footnote-51)正如康德本人所认为，当范畴离开一切感性条件之后，就只具有纯逻辑的意义而不是产生一种知识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丝毫不能告诉我实体具有何种规定性。”[[52]](#footnote-52)卡西尔洞悉到，按照卡尔纳普的进路，拒斥了时间的综合作用，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只能被限于严格的数理分析之中。卡西尔提出，如果将卡尔纳普关于物理学语言是唯一的主体间语言这一主张贯彻之后，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科学将被消除。既然哲学或目的论的任务必须是发展“经验认识的逻辑”，而如卡尔纳普的方法则切断了数理科学与文化科学的联系，因此，如果要寻求“精神”与“生活”的一致性，我们就决不能忽视时间在经验构造方面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卡西尔也正是从这个方面去解释康德的时间图型的，他认为，“我们思想的一切连接形式必须最终与时间空间的基本秩序相关联，并在其中‘图型化’——对康德来说，这不过意味着，它们必须最终在确定经验对象的过程中证明其有效性。”[[53]](#footnote-53)

## （三）直面康德的时间困境

作为曾经的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干将，卡西尔显然认同“回到康德去”的主张。因此，对于时间的这两种断裂的解释，他以康德曾指出的有限的人可以进入必然的真理领域的观念反对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和时间图型的激进解释；并借助康德的分析方法指出文化科学的实际存在与重要性向卡尔纳普所代表的维也纳小组的“物理主义”与“逻辑主义”明确提出挑战。（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卡西尔是如何希望在这些批判的基础上以一种“功能的”时间主张以及“符号形式的”哲学重新建立康德那样跨越鸿沟的桥梁。）当然，对于康德的主张，卡西尔的阐释正如海德格尔的阐释一样，都或多或少带有自己的认识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卡西尔本身对康德的时间图型问题进行过直接的探讨，而他的探讨可以使我们看到，康德的这一裂隙是如何在卡西尔的努力下通过一种“功能性”的解释被消解，这一“功能性”的消解又是如何为卡西尔后期使时间重新作为自己构筑知识的统一性的工作中主观到客观的过渡的“重建时间图型” 打下基础的。

卡西尔本人在后康德时代唯心论传统和新康德主义传统下，明确意识到时间图型产生的感性与知性无法联系的困境。对于这一矛盾的解决，卡西尔继承新康德主义传统，同样极力反对康德本人立场所特有的二元论的心灵概念。在《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中，卡西尔以这样的方式消解这一矛盾，即康德在先验感性论中阐述的心灵两种能力间的截然区分的思想继承自 1770年教职论文的前批判时期，而那时关于知性通过“生产性的综合”的先验图型的批判理论尚未产生。[[54]](#footnote-54)这样的解释使拒斥感性与知性二分变得更加正当。正如新康德主义者柯亨曾指出的那样，当我们达到真正批判的先验分析论，所有“综合的统一性”，包括时间的统一性都归因于知性时，这种初始的截然分离必须被重新修正。心灵的二元能力被推翻，因此先验演绎失去了意义，而生产性的综合则被理解为一种“共同的创造性的高级概念”因之获得重要的地位。在卡西尔看来，“生产性的综合”表示思想的基本创造活动，通过这一活动，思想逐步产生了经验自然科学知识的对象。不过，在卡西尔对康德问题进行批判和重建的过程中，在感性与知性分离前提下起到重要中介作用的时间的先验形式并没有被抛弃，而是作为综合的基本原则之一发挥作用。[[55]](#footnote-55)综合本身成为了能动的活动，而时间则通过在这样一种活动中的“功能性”体现出来。他指出，“综合构成了一种内在不可分的统一过程，但它却可以根据其起点或终点被确定和刻画。它起于知性，但立即变成了纯粹直观，从而通过后者的中介获得经验实在性。于是，直观和概念的初始分离更清晰地消解为一种纯粹的逻辑关系。”[[56]](#footnote-56)时间之所以被称为“纯粹直观”，并不是因为它是心灵自身的一种非推理能力的表达，而是因为它属于知识逐步构成的过程中构造性经验思想的第一批产物。“时间之所以是‘直观’是因为它们是任何经验内容都必须在其中被把握的基本的秩序。因为正是借着它们，纯粹的感觉材料才被提升至意识‘表象’。”[[57]](#footnote-57)对于康德的这样一种解读或阐发将康德认识构造的过程又一次颠倒过来。在康德看来，纯粹的形式逻辑处理的是纯分析的统一性，它需要与先验逻辑的综合统一性明确的联系起来；而在卡西尔这里，我们开始于在经验自然科学知识的逐步构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而纯粹的形式逻辑只是从这种统一的构造中得出的一种抽象。（因而，卡西尔在批判卡尔纳普时认为，“只有当我们理解了逻辑和数学所基于的同样的基本综合也支配着经验知识的科学构造，是它们使我们有可能谈及现象间的一种固定的规律性的秩序，从而谈及它们的客观意义——只有到那时，才能真正证明逻辑与数学的正当性。”[[58]](#footnote-58)）我们起步于思想的构造能力（即思想的“生产性综合”），而它的统一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原则的。我们的感觉表象获得真理和与“对象的关系”，不是通过反映一个实体的“物”，而是通过将我们的感觉表象和经验现象本身纳入一种关系结构中。理论并不提供存在于现象之流背后的实体的“摹本”，而是提供一套关系结构与存在于现象本身之间的普遍的规律关系相对应。时间与空间发挥着功能性的作用，来保证这种结构上的对应。

在明确拒绝康德本人的心灵二元论基础上，时间图型产生的困境在卡西尔处得到消解。通过对于认识方式的重新阐释，“生产性的综合”本身便是一种能动的综合活动，而时间的性质就在于它的功能性，就是将认识的对象不断纳入认识的 “关系结构”的“任何经验内容都必须在其中被把握的第一位的和基本的秩序。”

综合本身就是活动，而时间与纯粹知性一样，是“这种综合统一功能的基本形式的不同显示和表现”。时间的性质就在于其功能性，在于其是科学知识的逐步构成中构造性经验思想的第一批产物。[[59]](#footnote-59)时间的两重理解在这种语境下得到统一，在卡西尔处，作为框架的时间（“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与作为认识能力的时间（“只有借助它 [时间]，纯粹的感觉材料才被提升至意识表象的地位”）最终重新获得了一致性。

# 三、重获“图型”地位的时间：主观到客观的保证

卡西尔通过将感性和知性都纳入康德的“生产性综合”下，以一种统一的能动作用的发挥而力图避免康德二元论产生的困境。而对于时间的处理，则是使它作为这种综合统一功能的基本形式，以一种“功能性”的阐释统一了康德文本中对于时间性质和作用的两种分裂理解。这种对于时间的阐释使得卡西尔建构自己的“关系理论”得以开展，而他关于认识的此种理论在后期则发展成为力图超越海德格尔时间性以及新康德主义的寻求整体性的符号形式哲学。 而时间，则最终在卡西尔的认识论体系中，作为从主观过渡到客观的保证，重新获得了整体性中的中介的“图型”地位。

## （一）时间与认识的关系结构

在认识论领域中，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以及新康德主义传统一样，都反对知识的“摹本论”。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指出，从亚氏《解释篇》到《纯粹理性批判》，都把真理解释为“灵魂”的体验与物的相似，或认识同它的对象的相符。然而从存在论的角度，无论是表象之间，表象同实在的对象以及心理之物与物理之物，都不存在这样的符合。[[60]](#footnote-60)在这一点上卡西尔同样认为，这种由抽象主义达到的“摹本论”是需要反驳的。卡西尔指出，概念通过个别感觉对象归纳向上得到的抽象主义是传统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产物，而按照这种属种关系得到的传统主词-谓词逻辑的承诺，就意味着承诺了“实体作为可变性质的固定的、最终的基石”这一传统形而上学的观念。于是，“摹本论”便不可避免地产生，而根据这种理论，我们的真理就在于表象与表象背后的终极的“物”或“实体”的图像相似关系。不过，与海德格尔力图从存在论的角度主张知识是“就存在者本身揭示存在者”不同，卡西尔力图将这种知识的“摹本论”替换成认识结构的关系理论。[[61]](#footnote-61)我们的表象获得知识以及“和对象的关系”，不是通过反映形而上学的“物”或“实体”，而是构造一种数学关系的理想的形式结构，而我们的经验现象和感觉表象都被嵌入其中，用数学表达的普遍规律的稳定性占据了最终的‘物’的持久基础的位置。“用对象经验所基于的‘纯形式关系’来解释实在性的理论提出了一种典型的自然科学认识论。我们的表象和感觉是对象的符号，而不是对象的摹本。我们要求图片与被描摹的对象具有某种相似性——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从来无法保证，而符号则不会要求诸要素中实质的相似性，而只要求双方的结构有一种函数性的对应。在这种结构中确立的不是被描写的事物的特殊特征，而只要求双方的结构有一种函数性的对应。”[[62]](#footnote-62)卡西尔所主张的“综合”与综合的基本形式——时间，正是在这样的认识的一种“关系结构”中发挥能动作用。这种关系结构是基于功能性的，而只有这种通过功能性来与对象相联系的方式才能保证经验对象的整体性。“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存在物或性质的整体，而是表达量度的特定关系、表达现象中的某些功能和依赖性的抽象符号的整体。”这种关系的结构使得“这种动态确定的形式不再属于直观本身，而是通过‘知性原则’本身，现象的存在获得了综合的统一性，在某种特定的经验概念中被集中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63]](#footnote-63)。在这样的认识过程中，起功能性作用的时间是不可忽视的。“虽然时间实质上是一个从不同的瞬间拼凑而成的集合体，但是我们可以把时间理解为一个功能性的能动的整体，关系和因果的统一体。”[[64]](#footnote-64)对行为的时间整体性的直觉包括行为的主体和行为指向的目的，并且时间概念的综合能力使上述处于完全不同阶段的对立的两极转换成一种相互的关系。这样，在行为的一开始，在行为的背后就有了行为主体的整体的能量，并且行为之前就有了行为的整体目的。只有当时间概念的综合能力像这样将行为的片段加入因果性和目的性的整体中，加入能动的综合的目的性意义的整体中，时间的统一性表象才成为可能。[[65]](#footnote-65)功能性的时间保障了认识过程的统一性。

卡西尔此种对于认识的关系结构主张，延续着康德“哥白尼革命”对主体自觉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从下面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卡西尔的这种强调功能性的认识主张与康德的渊源。“哲学不再宣称能对知识的实质性内容有所增进，不再宣称能经由教导式的洞见去扩展那些具体知识领域所勾勒的疆域。它满足于探究知识的功能，满足于理解和建构这种功能。”[[66]](#footnote-66)当然，我们不应该忽视，力图消解“精神”与“生活”对立的卡西尔关于认识的关系结构理论最终超越了康德作为哲学基础的实证科学，而是以符号为基础，纳入了语言、艺术等其他人类文化的分支。因为如果仅仅将他的认识结构理论作用于康德的理性批判的范围或者是新康德主义的数理科学范围，无法弥合对于时间的两种解释与应用以及沿着这种分裂产生的存在论与逻辑主义的鸿沟。而正是在他的这种建构中，我们可以发现，时间作为从主观过渡到客观的保证，重获了“图型”的中介地位。

## （二）时间与整体

功能性的认识关系结构取代了传统的“摹本论”，但我们仍需考察，感性与知性的知识是否以及如何能被纳入这种认识结构的发展中并取得一致性。鉴于卡西尔已经明确他的融合任务的一端是逻辑和数学物理学所有的纯粹的关系概念，因而他需要的是为自己的认识结构找到另一端的起点。卡西尔认为，“如果我们把精神当做某种自存的东西，当做起始和中间是分离的，那么精神的‘终点’就难以被把握和表达。哲学反思并不以这种方式与中间和起始相对立来设置终点，而是把三者当做一种统一的整体发展的组成要素。”[[67]](#footnote-67)而根据他的看法，所有不同的世界表象方式的统一性即在于它们都是精神表达的符号形式。卡西尔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中表达了相似的想法，并且继续道：“因此，如果按照黑格尔的要求，‘科学’被认为是为自然意识提供导向其自身的‘梯子’，那么它就必须把这个梯子设置得更低一级……因为一切知识发展的固有出发点，它在直接事物中的起始，与其说在感性领域，不如说是在神话直观领域中。”因此，对于卡西尔的认识关系结构的发展而言，其“起始”是神话，“中间”是知觉意识，是自然语言，“终点”则是理论科学。而时间，则在这种符号及符号最重要的形式之一——语言的功能性的基础上产生，并通过自身的功能性指向，保证了主观到客观形式的过渡，从而使卡西尔的理想成为可能，即“在所有精神活动领域中，作为其内在进步的真正工具，它们让一个本身自由的图像世界（Bildwelt）在知觉世界的一旁和之上产生：这个世界根据其直接特性仍然完全带有感性色彩，然而却表现了一种已经被赋予形式的、从而由精神支配的感性……通过一种由我们所赋予的独立创造(Prägung)，艺术和神话，科学和语言在这个意义上都是朝向存在的创造，而最终通过意义的统一性结合在一起。”[[68]](#footnote-68)在卡西尔最终形成的符号形式理论中，作为能够将认识的对象不断纳入认识的 “关系结构”的“任何经验内容都必须在其中被把握的第一位的和基本的秩序”的时间在语言的发展中产生（统一的时空秩序通过语言中冠词和时态指定了感知对象相对于说话者变化的时空位置的方位而产生），构成日常感知的“直观世界”。然而进一步，当我们从所有指向 “此时此地”的关系中抽象出来，转而思考一切可能的“此时此地”的点都被纳入到其中的一个关系结构时，就会从直观的空间和时间中发展出数学的空间和时间。正如我们上文所提，这种关系系统之所以能形成，正是通过将时间理解为能动的、关系和因果相统一的功能性整体这种方式达到的。通过时间的功能性指向，出发于直观的时间没有仅仅停留并将人圈定在时间以及有限性之中，相反，它揭示了一条通往普遍有效性以及向数理科学理论发展的路。因此在卡西尔这里，正如他在与海德格尔的辩论中所说，在康德那里，时间图型是开端而不是终点。

卡西尔最终找到这样一条以基本和原始的直观表象为出发点，进而以关系结构的“功能性”朝向一种真正客观的、“普遍有效的”科学真理领域发展的符号哲学 。因而，虽然卡西尔承认海德格尔“对时间性等概念在更加基本和原始的人的直观表象所扮演的角色作了非常有启发的分析”[[69]](#footnote-69)并以此作为存在性的基础和出发点，但对于时间的运用则超越了海德格尔的“时间性”并作为主观到客观过渡的保证。“这种‘时间性’在‘符号形式哲学’中绝不会得到任何怀疑，因为它理应被揭示为‘此在之生存性’的最终基石，而其特殊性清晰可见。但问题应该首先从超越这一点开始：在它的起点处，从这种‘生存论’时间到时间形式的过渡得以实现。这种形式的可能性条件被希望展示为设立一个超越于此在之生存性的‘存在者’的条件。时间的这一过渡，这一从此在的存在意义到‘罗各斯’的客观意义的转移，就是它固有的主题。”[[70]](#footnote-70)

时间最终超越了“时间性”的有限，通过时间形式的功能性抽象，直观表象过渡到客观意义成为可能。而这也正保证了经验对象与理论科学的统一性。因此，虽然卡西尔明确指出康德本人认为的科学概念形成的形式是一切一般概念形成的形式这一点必须特别予以纠正而与康德的知性的先验图型概念决裂，我们却不能否认，作为主观到客观过渡的时间，保证了认识论的统一并且重新获得了“图型”的中介地位。

## （三）卡西尔的难题

在卡西尔评论康德文本中的经典力学观点时，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康德原初的经典牛顿物理学的观点看，理论世界和知觉世界非常自然的融合在一起，而这一情况正是源自康德纯粹感性学说的那些困难的根本。[[71]](#footnote-71)

然而，拒斥了康德的在数理科学和道德中表现出来的是同一种理智的能力的卡西尔理论，却正因为此在其系统中产生了问题。感性能力与理智能力之间的差异在此重新表现于直观的或表象意义与纯粹理论的意义之间的区分。前者包括由自然语言产生和描述的日常知觉的世界，后者则包括由现代理论科学所描述的纯形式的抽象世界。康德本人可以将二者的统一性奠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两种情况下都是同一种理智能力的作用，但这种统一性的形式对卡西尔来说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由于这里的一般“客观有效性”在现代抽象数学所特有的纯分析的时间形式的抽象中得到了“最高”体现，区别于理论原理的实践原理如何能够分享这种“客观有效性”是极不清楚的。

“因为尽管卡西尔坚持这样一种观念，即纯粹形式逻辑为我们提供了真正普遍的、主体间可交流性的范例，但他也希望在本质上非数学的文化科学中保持一种互补但仍然是普遍的主体间有效性。然而，他从未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两类极为不同的有效性是如何关联的——即使两者最终都被认为是纯粹范导性的理想。”[[72]](#footnote-72)

虽然卡西尔最终在其符号形式的整体设置一种统一性的方面仍然存在着问题，但是他对于时间图型产生的问题的解决与重建，仍然具有非常的意义。一方面，他明确认识到康德二元论以及对时间的两种不同理解所造成的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哲学分野。另一方面，对于20世纪初对于时间应用的两种典型而对立的哲学观点日益分立的局面，他则努力寻找一条康德式的综合之路。通过对于康德“生产性综合”的阐发，时间和“综合”的“功能性”意义被突出强调，并最终以这种“功能性”的统摄使时间的两种分裂的理解获得了一致性，而通过符号作为共同基础，时间的功能性作为重要连接，感性直观与知性理论被纳入了一种统一的认识的“关系结构”中。在这一过程中，卡西尔超越了康德对牛顿模型的坚持，超越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时间性”理解，最终赋予了时间在其构筑的具有整体性的“人类的能动世界”中连接主观与客观的地位。如果将卡西尔的这一进路视为对康德“时间图型”问题所造成困境的一种解答，那么其对于时间作用的理解与发挥，以及对于时间“图型”地位的重建，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 参考文献

[1] Desmond Hogan. “Kant’s Copernican Turn and The Rationalist Tradi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ed. Paul Guy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 E. Cassirer,.Substance and Function. Translated by W. Swabey and M. Swabey.Chicago: Open Court, 1923.

[3] 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ume One: Languag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alph Manhei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4] 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ume Two: Mythical Thought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alph Manhei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5] E. Cassirer．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ume Three: The Phenomenology of Knowled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6] E. Watkins. Kant and The Metaphysics of Caus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7] Frederick C. Beiser. Fate of Reason: 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Fich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8] H. Robert. 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An Analysis of Main Themes In His Critical Philosophy.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9] Immanuel Kant. Correspondenc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rnulf Zwei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 Immanuel Kant. Notes and Fragments. Translated by Curtis Bowman. Paul Guyer and Frederick Rausc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 J. Krois. Cassirer: Symbolic Forms and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 Lewis White Beck. Early German Philosophy: Kant and His Predecesso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3] Lewis White Beck. Early German Philosophy: Kant and His Predecessor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4] M. Friedman. 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 Chicago: Open Court, 2000.

[15] M. Friedman. Kant and the Exact Scienc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6] M. Heidegger.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Richard Taf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 Otfried Hoffe. Immanuel Kan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shall Farri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

[18] Wolin,R. 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 P. F. Strawson. Bound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New York: Routledge, 1966.

[20]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2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22]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

[23]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24] 康·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韦卓民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

[25] 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26]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27] 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28] 卡西尔.《符号·神话·语言》.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29] 邓晓芒.《西方哲学探頤》.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

[30] 邓晓芒.《康德哲学问题诸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31] 邓晓芒.《康德时间观的困境和启示》.《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

[32] 邓晓芒.《康德论因果性问题》.《浙江学刊》2003 年第2期。

[33] 杨祖陶.《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34] 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35] 袁建新.“康德图型法的必要性”.载于《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36] 方向红.“矛盾律与时间性——试论海德格尔对康德真理与时间观的批判”载于《德意志思想评论》第二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

1. “图型”（Schema）一词，又译作“图式”、“构架”等，本身具有直观上的“图表”含义，同时又具有抽象的“模式”、“模型”含义，康德用这一术语表达先验范畴与直观杂多联结的中介。而在康德文中，范畴的图型亦即“时间之先验规定”。因此，我们沿用“时间图型”这一表述来指代时间的先验规定以及其图型中介的作用。（参见第6页注释2） [↑](#footnote-ref-1)
2. 康德在证成诸先天综合判断之客观有效性时，将后者界定为普遍有效性，客观性便从传统意义上的主客符合论转换为主体间可传达的普遍有效性。 [↑](#footnote-ref-2)
3. 参见邓晓芒：《康德时间观的困境和启示》，《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我们将在第三节讨论这一问题。 [↑](#footnote-ref-3)
4. 根据逻辑主义的观点，现代数学的发展表明，数学可以通过纯粹的形式逻辑来表示，从而使得拒斥康德所认为的数学的综合特征，进而将时间概念排除在认识结构外成为可能。参见E. Cassirer, *Kant und die moderne Mathematik*, In *Kant-Studien* 12, pp44-45, adopted from J. Krois, *Cassirer: Symbolic Forms and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这一问题将在本文第二章第二节得到更详细的阐释。 [↑](#footnote-ref-4)
5. 新康德主义拒绝感性与知性二分的方式大多在于拒斥独立的纯直观能力。参见Friedman, *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 P28. [↑](#footnote-ref-5)
6. 关于“‘精神’与‘生活’”：毫无疑问，康德后的大多哲学家都力图消解康德哲学以及以往形而上学中的争论。无论是胡塞尔-海德格尔，还是卡尔纳普，都认同传统形而上学中“存在”与“生成”、“一”与“多”等两两形而上学概念可以在哲学的发展中被消解掉（后者曾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中明确表示，通过构造理论，“实在论、唯心论等几种所谓认识论派别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一致的……构造理论表现了它们共同的中立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认同Krois的观点：“‘精神’与‘生命’之间的对立居于这种形而上学的核心。它被证明如此具有决定性，以至于它似乎逐渐吸收了在形而上学史上被创造出来的所有其他对称概念，并由此消除了它们。”卡西尔所面对和力图解决的即是这“从生活纯粹的直接性向文化和思想的间接性的跌落”的对立。卡西尔如何通过时间功能性的指向的发展代替这最后一种二元对立将在第三章中详细探讨。 [↑](#footnote-ref-6)
7. 康德之前，在唯理论和经验论者看来，客观实在性意味着对于概念所表达的属性或关系，有相应的客观实存的来源或对象；普遍有效性则意味着在一切对象之中都能发现概念所表达的属性或关系，因而概念可以普遍地应用与一切对象。对于该问题的解决，双方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footnote-ref-7)
8. 参见康·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韦卓民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75页、第293页。学者如杨祖陶虽然不同意斯密关于时间意识是客观演绎的出发点，但也仍认为“主观演绎是第一个阶段，它的出发点——时间中杂多表象的经验意识，同时也是作为整体的先验演绎的出发点。”参见 杨祖陶：《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 [↑](#footnote-ref-8)
9. “图型”是本文中多次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因此有必要在此处再一次进行说明。康德对于“图型”与“图型法”（Schematismus）作了如下定义，“我们将把知性概念在其运用中限制于其上的感性的这种形式的和纯粹的条件称为这个知性概念的图型，而把知性对这些图型的处理方式称之为纯粹知性的图型法。”（《纯批》A140/B179）。他同样指出，“范畴运用于现象之上只有借助于先验的时间规定才有可能，这种时间规定作为知性概念的图型就是现象与范畴的媒介”（A139/B178）。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范畴的图型就是先验的时间规定。 [↑](#footnote-ref-9)
10. Otfried Hoffe*, Immanuel Kan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shall Farri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pp86-89. [↑](#footnote-ref-10)
1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A50/B74） [↑](#footnote-ref-11)
1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6页。（A137/B176-A138/B177） [↑](#footnote-ref-12)
13. Paul Guyer, Ka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96-97. [↑](#footnote-ref-13)
1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第110页。（A145-A146/B185） [↑](#footnote-ref-14)
15. 同上书，第106页。（A138/B177） [↑](#footnote-ref-15)
16. 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 [↑](#footnote-ref-16)
1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第107页。（A140、B179） [↑](#footnote-ref-17)
18. 同上书，第78页。（B152） [↑](#footnote-ref-18)
19. M. Heidegger,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Frankfurt am Main, 1991, S. 133, 转引自 方向红:《矛盾律与时间性——试论海德格尔对康德真理与时间观的批判》载于《德意志思想评论》 [↑](#footnote-ref-19)
2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0页。（A146/B185） [↑](#footnote-ref-20)
21. Immanuel Kant, *Notes and Fragments*, translated by Curtis Bowman, Paul Guyer and Frederick Rausc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80. [↑](#footnote-ref-21)
2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5页。（A91/B124） [↑](#footnote-ref-22)
2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第109页。（A144/B183） [↑](#footnote-ref-23)
24. 同上书，第137页。（A193/B238） [↑](#footnote-ref-24)
25. 同上书，第139页。（A198/B244） [↑](#footnote-ref-25)
26. 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探讨与争论被附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文后附录中。参见M. Heidegger,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Richard Taf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7, p209. [↑](#footnote-ref-26)
27. 参见袁建新：《康德图型法的必要性》，载于《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在晚年（1796-1798年）所写的注解中，康德仍然认为“图型法”是《纯粹理性批判》中最重要的章之一。” [↑](#footnote-ref-27)
2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页。（A41/B58） [↑](#footnote-ref-28)
29. Immanuel Kant, *Correspondenc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rnulf Zwei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538-539. [↑](#footnote-ref-29)
3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第30页。（B51） [↑](#footnote-ref-30)
31. 同上书，第37页。（B68） [↑](#footnote-ref-31)
32. 参见邓晓芒：《西方哲学探頤》，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31-133页。 [↑](#footnote-ref-32)
33. 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footnote-ref-33)
34. 这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关于知识“发生学”（genetic）的普遍看法。经验认识的实际对象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进步朝之趋近的永远不会完成的“X”。在其观点中，经验认识的实际个体对象在科学的方法进步中不在场。参见E. Cassirer, *Substance and Function*, translated by W. Swabey and M. Swabey, Chicago: Open Court, 1923, p315. [↑](#footnote-ref-34)
35. M. Friedman, *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 Chicago: Open Court, 2000, p156 [↑](#footnote-ref-35)
36. 迈克尔·弗里德曼语，参见上书xi。 [↑](#footnote-ref-36)
37. 参见邓晓芒：《康德时间观的困境和启示》，载于《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原文为，“而就时间本身来说，它是不能单纯当做对象来客观地考察的，它是‘力’，是运动，是自发性和能动性，是一切存在的根。康德时间观的这一秘密，在一百多年后由海德格尔揭示出来了。” [↑](#footnote-ref-37)
38. M. Heidegger,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Richard Taf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75. [↑](#footnote-ref-38)
39. 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发表了这一阐释，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其附录中，包含了海德格尔为达沃斯辩论所作的笔记以及卡西尔-海德格尔辩论的规程。 [↑](#footnote-ref-39)
40.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0-31页。 [↑](#footnote-ref-40)
41. M. Heidegger,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Richard Taf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73. [↑](#footnote-ref-41)
42.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footnote-ref-42)
43. 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第93页。 [↑](#footnote-ref-43)
44.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footnote-ref-44)
45. M. Friedman, *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 Chicago: Open Court, 2000, p138. [↑](#footnote-ref-45)
46. 同上书，第123页。 [↑](#footnote-ref-46)
47. 同上，第123页。 [↑](#footnote-ref-47)
48. 参见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卡尔纳普认为这种“一致”是无可争辩的。 [↑](#footnote-ref-48)
49. 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 [↑](#footnote-ref-49)
50. M. Friedman, *Kant and the Exact Scienc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52. [↑](#footnote-ref-50)
51. E. Cassirer, *Kant und die moderne Mathematik*, In *Kant-Studien* 12, pp44-45, adopted from J. Krois, *Cassirer: Symbolic Forms and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footnote-ref-51)
52. 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第180页。 [↑](#footnote-ref-52)
53. J. Krois, *Cassirer: Symbolic Forms and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p42. [↑](#footnote-ref-53)
54. E. Cassirer, *Das Erkenntnis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der neueren Zeit*. Berlin: Bruno Cassirer, 1922, p653, adopted from M. Friedman, *A Parting of the Ways.* Chicago: Open Court, 2000. [↑](#footnote-ref-54)
55. 同上书，第653页，卡西尔原话为，“作为综合的基本原则的时间与空间”。 [↑](#footnote-ref-55)
56. 同上书，第697-698页。 [↑](#footnote-ref-56)
57. 同上书，第699页。 [↑](#footnote-ref-57)
58. 参见注释36。 [↑](#footnote-ref-58)
59. M. Friedman, *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 p91. [↑](#footnote-ref-59)
60.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第204页。 [↑](#footnote-ref-60)
61. 在这一点上，卡西尔的立场和卡尔纳普十分接近。 [↑](#footnote-ref-61)
62. E. Cassirer, *Substance and Function*, translated by W. Swabey and M. Swabey, Chicago: Open Court, 1923, p304. [↑](#footnote-ref-62)
63. 卡西尔进一步认为，在这些知性的规定中，超越康德时空观的非欧形式的定律可以进入，而我们关于现象整体秩序的经验概念的统一性可以在更高层面得到融合。在卡西尔这里，他基于广义相对论考虑时间问题。 [↑](#footnote-ref-63)
64. 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ume One: Language,*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alph Manhei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222. [↑](#footnote-ref-64)
65. 同上书，第222页。 [↑](#footnote-ref-65)
66. 卡西尔：《符号·神话·语言》，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页。 [↑](#footnote-ref-66)
67. 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ume two: Mythical Thought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alph Manhei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xi-xvi. [↑](#footnote-ref-67)
68. 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ume One: Language*, p81. [↑](#footnote-ref-68)
69. 参见注释33。 [↑](#footnote-ref-69)
70. E. Cassirer, *Die Idee der Republikanischen Verfassung*, Hamburg: Friedrichsen, adopted from, M. Friedman, *A Parting of the Ways: Carnap, Cassirer, and Heidegger*, p139. [↑](#footnote-ref-70)
71. 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ume Three: The Phenomenology of Knowledge*, p459. [↑](#footnote-ref-71)
72. M. Friedman指出：“坚持文化科学有其自身独特的“客观性”和“主体间有效性”形式是卡西尔整个进路的核心内容。但是从一种系统的观点来看，这种形式的“客观性”如何可能与数理科学的特征统一或整合起来，或者基于同样前提，两者如何可能与道德和定律的特征统一起来，却仍然是不清楚的。” [↑](#footnote-ref-72)